

国际垄断的新阶段。从现阶段国际正义力量和国际阶级斗争的曲折发展来判断，21世纪是新帝国主义占主导地位的时代，是世界劳动阶级进行新的“伟大革命”和建设的时代，是资本主义和新帝国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

共享发展理念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探索

西南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院教授 刘 灿

一、共享发展是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核心价值

共享发展是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两极分化式发展批判基础上，对未来社会主义社会发展方式的科学揭示，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就是建立在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共享发展基础上的。马克思恩格斯曾提出“真正的共同体”概念，他们用这一概念特指一种由人民群众共同参与治理公共事务的生存和生活样态。“在真正的共同体的条件下，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①

马克思把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人的权利的基本内涵，同时把人的劳动实践活动作为权利实现的途径和过程。他认为只有在现实的世界中并使用现实的手段才能实现真正的解放，也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从这个意义上讲，共享发展理念作为人类经济社会活动的先进理念，必须体现人的共同意志，体现人的“类”本质，体现人的主体性地位，如此才能防止人在发展中出现异化。在马克思看来，市场体制、赤裸裸的金钱交换关系支配的整个自由资本主义历史阶段，以纯粹利己为核心动机和价值目的的所谓“理性经济人”，构成其全部社会关系尤其是生产关系主体的最重要特质。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73页。

马克思认为,在共产主义社会中,社会生产关系的主体的生存特质实现了质的转变,这一转变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历史过程。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论及未来的新制度及其形成时,马克思是这样描述的:“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上,在迫使人们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他们的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①

共享发展与共同富裕是两个密切相关的范畴。共同富裕是指发展成果由全体人民共同享有,它既是人们追求的梦想,也是实现后的一种状态。因此,共同富裕的内涵中必然包含共同享有。从共享自身的内涵看,共享的主体是全体人民而不是一部分或少数人,不管是个人还是群体,都有平等的资格和机会参与经济社会活动。共享不等于共有或均享,不能无偿占有他人劳动或损害他人的正当权益。共享发展是建立在社会公平正义、共建基础上的共享,即建设越多、贡献越大,享受发展成果的能力和机会也越大。共享经济发展成果是最重要、最基础的共享,但不是共享的唯一内容;践行共享发展理念不是只解决基本社会民生问题,还包括满足人民的精神层面的需求,包括干净的空气、丰富的闲暇休息和文化生活等等,即包括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等在内的全面共享。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生产发展不充分、不均衡的条件下,还不能实现全方位、全领域的共享,而是“渐进共享”和“有条件的共享”,并需要通过法律法规形式,建立秩序和规则,为共享发展提供稳定的社会预期和长期的制度保障。从这几个方面的意义上讲,共享与共富有着相同的涵义,因此,共同富裕必然包含共享共富。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追求共享发展与共同富裕的实践探索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国体和政体,经过全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社会主义的制度体系,为共同富裕理念奠定了制度基石。中国共产党以“实现共产主义”作为党的最高纲领,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① 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载于《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05-306页。

作为党的根本宗旨,符合共建、共享、共富等社会价值的追求。1953年12月16日,中共中央通过了《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指出“为着进一步地提高农业生产产力……并使农民能够逐步完全摆脱贫困的状况而取得共同富裕和普遍繁荣的生活”。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根本前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进行了艰辛的社会主义建设探索。在分配领域,通过实行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采取均等的按劳分配方式尝试共享和共同富裕。

邓小平是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也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共同富裕理论的主要奠基者和实现共同富裕的领路人。邓小平认为,共同富裕“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除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现共同富裕目标方面,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力,第二是共同致富”,实现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是大力发展生产力,即“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中心任务是发展生产力”。^①在共同富裕的实现路径上,邓小平反复强调,“我们允许一些地区、一些人先富起来,是为了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所以要防止两极分化”。^②邓小平时代沿着这样的思路对经济体制进行了大胆的改革。在农村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城市开始发展商品经济,同时实行对外开放、建立经济特区、鼓励东部沿海有条件的地区率先实现现代化等。在分配领域,打破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提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在效率的基础上实现公平,通过先富带动后富,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1992年以后,党的领导集体不断继承、丰富和发展共同富裕思想。党的十四大报告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兼顾效率与公平,运用包括市场在内的各种调节手段,既鼓励先进,促进效率,合理拉开收入差距,又防止两极分化、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在分配领域,实行按劳分配和按要素贡献分配相结合的方式,以及效率与公平相统一的原则,追求社会发展成果共享;促进区域平衡发展,追求区域共享。

党的十六大制定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强调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每一个阶段都必须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兼顾效率与公平,指出共同富裕思想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核心内容之一。

党的十七大强调“以人为本,科学发展,更加注重公平”,提出科学发展观的战略

①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54-255页。

②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95页。

思想。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就是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以人为本、关注人的多方面需求和全面发展极大地扩展了共享和共富的内涵。

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总目标的要求，明确坚持走共同富裕道路，“要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提出“人人参与、人人尽力、人人享有”的共享发展理念。

党的十九大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新的历史定位，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时，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时，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

从十七大提出“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到十八大再次肯定“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的提法，表明了党和政府在对再收入分配领域中出现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重视和缩小差距的决心；从十七大提出“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到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共享发展的理念”，标志着我们在共同富裕和共享发展理论与实践上由“先富论”向“共富论”再到“共享论”的转变。这一转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改革与发展实践经验的历史总结，也是在此基础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

改革开放40年来，共享发展一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主线，在追求共享发展和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中，国家逐步富强，人民逐步富裕，人民群众从改革和发展中得到了实惠。1978年，我国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按照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当时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只有156美元，2017年，我国人均GDP已达到9480美元，上升为中等偏上收入国家，与高收入国家（人均GDP12700美元）已相当接近；1978—2017年，我国GDP以年均9.5%的速度增长了39年，现有经济规模已经是1978年的34倍。^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贫困人口从1978年的2.5亿人下降到2017年的3046万人，贫困发生率从30.7%下降到3.1%；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创造了减贫史上的最好成绩，5年累计减贫6853万人，消除绝对贫困人口2/3以

^① 统计资料来自林毅夫：《改革开放创40年经济增长奇迹》，《经济参考报》2018年5月3日。

上。^①但同时,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也出现了发展不充分不均衡的问题。现阶段我国收入分配领域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主要是,社会成员之间收入差距过大,基尼系数超过国际警戒线;财产占有在社会成员间的分布差距大;初次分配领域资本与劳动的分配关系失衡。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享发展理念下的发展道路

(一) 发展是为了人的全面发展

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马克思认为财产权和所有制不仅是一种与物质生产力发展有关的生产关系,它本质上包含着人的发展的基础条件,即能否突破旧的社会分工和机器大工业对人的束缚,消灭并剥夺任何人利用财产的占有权去奴役他人的权力,重建“劳动者个人所有制”和自由人联合体,最终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马克思追求的是人的全面发展,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发展只不过是人的全面发展的基础。

经济生活中的发展如果背离了发展是为了人的发展观,发展将是不可持续的。先期发展的国家存在着这种现象。美国学者加尔布雷思曾经批评资本主义国家把经济增长作为主要目标,对物的关注胜过对人的关注,认为应当改变这种现象,应当对人本身给予充分关注,确立和追求公共利益或最大限度地满足公众需求的公共目标。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在《以自由看待发展》一书中,同样批评了将发展等同于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或个人收入的提高,或工业化与技术进步,或社会现代化等的观点,认为这些都是狭隘的发展观,最多属于工具性范畴,是为人的发展服务的。进入2000年,世界各国领导人在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上商定了一套时限为15年的目标和价值指标,强调自由、平等、共济、宽容、尊重大自然和共同承担责任,最终是为了人的发展。^②

① 《四十位代表委员热议改革开放40年·民生篇》,《光明日报》2018年3月3日。

② 李义平:《马克思的经济发展理论:一个分析现实经济问题的理论框架》,《中国工业经济》2016年第11期。

（二）以共享发展来解决不平等、不均衡问题

经济增长与发展理论认为，一国人均收入的高低取决于该国的长期经济增长。同样，增长理论与各国发展的历史经验表明长期经济增长关键是实现经济的转型，即实现从传统马尔萨斯陷阱向现代持续经济增长的转变。长期经济增长进程必然经历经济成果的分配过程，该过程是收入分配理论研究的主要内容。不同的收入分配必然造成收入的不同分布，并进而影响一国的经济福利。根据各个发展中国家的经验，经济转型和实现长期经济增长并非能自行解决收入不平等问题。另一方面，社会制度结构也会影响一国的经济增长，如果经济增长的成果不能为全体社会成员共享而是被少数人或社会利益集团占有，经济增长将失去普遍的激励机值。

经济增长的成果如何让人民共享，特别是让穷人受益？20世纪以来发展经济学根据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增长经验概括出了“包容性增长”和“益贫式增长”的模式。“包容性增长”这一概念最早由亚洲开发银行在2007年提出。它的原始意义在于“有效的包容性增长战略需集中于能创造出生产性就业岗位的高增长、能确保机遇平等的社会包容性以及能减少风险，并能给最弱势群体带来缓冲的社会安全网”。包容性增长最基本的含义是公平合理地分享经济增长，其中最重要的表现就是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它涉及平等与公平问题，最终目的是最大限度地让普通民众从经济发展中受益。与此相关的是“益贫式增长”，它关注经济增长、不平等和贫困三者之间的关系。

发展中国家的增长实践表明，单纯的经济增长并不能自动惠及穷人，穷人的生活水平有可能随着经济增长而下降，因此“涓滴效应”并没有出现。在这个背景下，人们重新审视经济增长、贫困和不平等之间的关系并达成共识：高速的经济增长和对穷人有利的收入分配相结合能够导致绝对贫困下降的最大化，达到所谓的“益贫式增长”。为实现“益贫式增长”模式，一国必须努力实现较高且可持续的经济增长率、增加贫困人口参与经济增长过程的机会、提高贫困人口参与经济增长的能力，使其成为经济增长的推动者，而非单纯依赖社会保障和救济受助者。

（三）走贫困人口脱贫致富的中国道路

贫困人口脱贫致富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共同富裕的一个标志性指标。关于贫困的定义，世界银行在其年度报告《1981年世界发展报告》中指出：“当某些人、某些家庭或某些群体没有足够的资源去获取他们那个社会公认的，一般都能享受到的饮食、生活条件、舒适和参加某些活动的机会，就是处于贫困状态。”

贫困不只是物质和精神生活能力低于基本生活水准,更是机会的丧失,体现为社会的公正、不道义。当今世界各国都把减贫作为最大的难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全面推进现代化国家进程取得巨大成果的同时,扶贫开发事业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中国在30多年的扶贫过程中也形成了自己的扶贫经验和有中国特色的道路,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和赞誉。^①作为一个“二元结构”特征显著、城乡和区域发展差距较大的发展中国家,处于快速推进工业化、城镇化阶段的人口大国,如何平衡公平和效率的关系,提高发展的包容性,特别是如何帮助农村贫困人口走出贫困陷阱,是我们在新时代面临的重大课题。

(四) 有效调节收入分配

实践证明,只是通过社会再分配政策来缩小收入差距,如税收、转移支付、提供公共产品等并不能有效克服收入差距过大问题,需要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领域构建起一整套财产分布稳定机制和行之有效的财产再分配的经济调节机制,以之抑制和扭转整个社会财富的过度集中和财产分布过度不均的趋势。高基尼系数往往是一国在经济高速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现象,经济学面临的需要解释的问题是,高基尼系数是市场有效配置资源的自然结果吗?初次分配领域需要政府作为吗?经济增长与工资调节机制如何建立(政府、工会和劳工三方的利益关系)?税收政策(尤其是高的资本所得税、遗产税)对收入不平等的调节作用有多大?为什么一国在经济发展初期(低收入阶段)转移支付政策对收入不平等调节的效果可能更为显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需要总结和借鉴经验,立足国情,实现理论和实践创新。

^① 联合国《2015年千年发展目标报告》显示,中国极端贫困人口比例从1990年的61%,下降到2002年的30%以下,率先实现比例减半,2014年又下降到4.2%,中国对全球减贫的贡献率超过70%。http://intl.ce.cn/sjj/qy/201701/16/t20170116_19617431.shtml。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截至2017年末,全国农村贫困人口从2012年末的9899万人减少至3046万人,累计减少6853万人;贫困发生率从2012年末的10.2%下降至3.1%,累计下降7.1个百分点。<http://society.people.com.cn/n1/2018/0202/c1008-29802293.html>。